DOI:10.6249/SE.202203_73(1).0001

疫情下的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學校現場之回應

林子斌*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壹、前言

新冠疫情無預警地對全球的教育帶來深遠的影響，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 UNICEF）的報告指出，在疫情期間有超過 190 以上國家的學校為回應疫情緊急而暫時關閉（Memon, Rigole, Nakashian, Taulo, Chávez, & Mizunoya, 2020）。在疫情最高峰時，全球近九成的學生因此進入遠距教學或停學的狀態（UNESCO, 2022）。臺灣雖然在整疫情期間防疫表現相對良好，仍於 2021 年 5 月中之後讓學校進入線上學習模式。大環境如此快速變化更加強化 108 課綱中之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的重要性，一方面由於線上學習需要科技、資訊素養，另一方面在諸多關於疫情的社群媒體訊息中，如何篩選與判斷資訊，實屬媒體素養的範疇。因此，本期主題便設定在疫情期間，學校現場如何透過科技、資訊與媒體養的展現，因應疫情造成的停課現象。若要進一步探討，必須先釐清概念，這究竟是一個還是三個素養？

貳、概念的釐清：是一個、兩個還是三個素養？

在 108 課綱中的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是一個概念還是三個不同之理解？這是一個值得釐清的關鍵議題。蔡清田（2021）指出：

*本篇論文通訊作者：林子斌，通訊方式：Tzubin_lin@ntnu.edu.tw。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係指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之能力，培養相關倫理及媒體識讀的素養，俾能分析、思辨、批判人與科技、資訊及媒體之關係。此項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是跨領域的核心素養，涵蓋了現代社會生活當中不能或缺的「科技」、「資訊」、「媒體」等三類概念的複合構念，此項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雖然可以細分為三類概念，但在現代科技進步、媒體發達的資訊社會當中這些概念互動關係密切，彼此跨界相互交集成為現代公民生活所須具備的核心素養。

由前述引文可見，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可分成科技素養、資訊素養與媒體素養這三種，而三者是彼此相關的。這三個概念多是由西方引入，因此從其英文之原文或許可以更好地理解這三個概念。在總綱英文版裡，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為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Literacy and Media Literacy（教育部，2014），字面意思是兩種素養：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Literacy 與 Media Literacy，而非三種。在英文版總綱裡呈現的三面九項英文翻譯中，資訊與科技素養為一類而媒體素養自成一類。由英文用字發現，總綱裡的 competency 與此處的 literacy 皆譯為素養，兩個英文字所代表之概念究竟有何異同？因為這個討論並非本文重點，在此不深入探究，然劉源俊（2020）已經發現這個現象，除撰文討論兩者的異同，並提出清楚的建議，即「引進『素養』而與現有大家所熟悉的既有意義相扞格，將貽禍無窮」。

除了中文素養一詞有兩個對應的英文字之外，在蔡清田之說明中更見到媒體素養與媒體識讀這兩個詞的出現。若耙梳媒體素養的概念，其最早源自於英國的「媒體教育（Media education）」，而在後來數十年的發展中，變成包含多種取向的複雜概念（Lin, 2010）。Buckingham（2003）曾說明媒體教育指涉的是教授媒體相關知識的教育過程之統稱，而媒體素養則為這個教學過程的結果產出。換言之，接受媒體教育的個體所具備的就是媒體素養。若是以「媒體教育」與「媒體素養」這兩個詞在使用上有其地域性，在英國與歐陸過去較常使用「媒體教育」一詞（但是近年也改為使用媒體素養），美國與加拿大則使用「媒體素養」為主。

然而，media literacy 這個概念在 1990 年代中後期引進臺灣後，卻出現兩種翻譯：「媒體素養」與「媒體識讀」。教育部（2002）白皮書所採用的是媒體素養之翻譯，稱做「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而非媒體識讀教育。即便臺灣有官方之政策文本，仍無法阻止兩個名詞混用的實踐。這個現象某種程度揭示了臺灣討論媒體素養／媒體識讀的兩群學者在當初引進概念之時，對 media literacy 這個概念的不同詮釋，進而出現兩種翻譯名稱。以陳世敏、吳翠珍為主的政大學者採用媒體素養的譯法，而以成露茜為首以世新為基地的學者多使用媒體識讀一詞。雖然陳世敏（2008）曾撰文釐清這兩者之間的差異，

透過梳理國外不同取向及學者的說法，試圖從先後、層次、理念、方法、目標等角度區辨二者。但是，最終未能有效地消解一個Media literacy卻有兩種譯名的尷尬情況。而且若是如陳世敏所提出的，媒體素養與媒體識讀有諸多相異，那就不可能如蔡清田提出的「媒體識讀的素養」就是媒體素養。其實，筆者認為當初正是因為兩大傳播學者陣營在引進概念時，因不同理解而將同一概念譯成兩個中文名稱，其實內涵並無如此不同，建議教學現場的教師們，在理解這個概念時，回歸英文原文的名詞去理解即可，如此才能避免教學現場的進一步混淆。

在臺灣的脈絡裡，資訊科技素養討論起來相較單純一些，因為常指涉的就是科技使用的能力與判讀資訊的能力。科技使用的能力便是學校現場常見的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時，帶給學生的相關知識、技能與態度。資訊科技有從數位、線上或遠距教學的角度來理解，偏向技能性操作的層面；亦有從批判思考、資訊搜尋進行討論的層面。前者多屬與數位學習或資訊教育的學者；後者常見於圖書資訊領域的學者，但是兩者是有互相影響，彼此交融。尤其是數位學習在臺灣已經是發展長久與穩定的研究領域，在學校教育中也有相關的科目（Huang, 2013）。

但是，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卻又與媒體素養的概念有所重疊，而且這不只是出現在臺灣的脈絡之中，而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Lin, Mokhtar, & Wang（2015）曾以新加坡為例，探討資訊素養與媒體素養這兩個概念是如何地在新加坡政府相關的論述中被使用，而又有哪些相異與類似之處。在新加坡，資訊素養與媒體素養都有著重在資訊的取得、分析與批判的理解，但是資訊素養與媒體素養不懂之處在於其並未如媒體素養中特別強調「產製」（production）的重要性。然而，在臺灣目前仍缺少相關討論以協助釐清資訊素養與媒體素養這兩個概念的異同或者是實踐。雖然吳美美（2004）以二者進行分析與說明，但是該文仍只是介紹兩個概念並將其置於素養教育的框架下分別說明，並未有討論兩者可能重疊之處或主要的不同，而且對媒體素養之說明較缺乏對相關國內外文獻之討論，反而是以媒體素養教育白皮書內的內容為主，這樣是否能提供對「媒體素養」此一概念一個比較好的理解，這些都還有許多討論的空間。如前所述，資訊素養常由圖書資訊相關研究者使用，而媒體素養教育則是多在傳播領域進行討論。而這兩者的討論在近年來，漸漸有個趨勢，將兩者結合而將其稱為「媒體與資訊素養」（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MIL）（Grizzle, & Calvo, 2013）。

雖然可以採用蔡清田之說法，將三者視為不同卻又彼此有關連之一組素養，但是在疫情期間遠距教學或線上、混成等學習，比較多是科技素養或某種程度之資訊素養，較少與媒體素養有直接關連。這三者會給疫情間與疫情的學校帶來哪些挑戰而學校又該如何更好地回應？

參、代結語：學校現場如何回應？

疫情的影響下，當學校無法實體上課之時，教師學生的科技素養在某種程度上決定線上與遠距授課的成效，但是這個素養卻無法解決一些非直接教育因素的影響，例如：家庭的連線網路好壞、家中小孩較多時是否有充分的資訊設備上線？或者，其他的教學議題，例如：教師的線上課程設計如何讓學生能夠更好的參與？而本期的兩篇專題論文皆聚焦在線上、遠距學習的一些討論，首先遠距中輟這個概念更是在疫情期間浮現的新議題，十分值得教學現場重視，同時教師需要哪些策略與增能支持以便更好的進行線上教學也是本期專題的重點，期能透過現場的實證資料提供教學現場的教師們更好的策略理解。學術論文的部分則著重在疫情時代線上學習的情意層面，關照學習者的社會情緒學習，並據此提出疫情影響下親師合作的新可能。而在教學專題與實務分享上，與本期的專題論文類似，著重在線上學習帶來的挑戰，而這是從現場教師的觀察而來，或可以喚起現場教師更多共鳴。最後的特色學校，讀報教育或線上讀報的實踐，是疫情期間媒體素養教學的一種呈現。讀報教育在國民教育階段可能是為數不多的媒體素養教育實踐，雖然新課綱中有明確列出媒體素養為核心素養之一，但是媒體素養教育在學校受重視的狀況卻是有其高低起伏。而讀報教育能一枝獨秀仍能有場域進行實踐，其主因在於地方教育局處與部分報社持續的投入資源。期望本期的各篇文章，可以讓中學現場思考與面對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的定義與可能實踐，而疫情帶來的影響絕對是一個契機，提供反思與清楚界定課綱核心素養之可能。

參考文獻

吳美美（2004）。資訊素養與媒體素養——數位時代的素養與素養教育。**臺灣教育**，**629**，9-14。

教育部（2002）。**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教育部。

教育部（2014）。**英文版總綱**。https://cirn.moe.edu.tw/WebContent/index.aspx?sid=11&mid=9900

陳世敏（2008）。「媒體識讀」跟「媒體素養」有差別嗎？**卓越新聞電子報**。https://www.feja.org.tw/37925

劉源俊（2020）。正本清源說素養。**臺灣教育評論月刊**，**9**（1），13-19。

蔡清田（2021）。**108 新課程綱要核心素養的「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https://mlearn.moe.gov.tw/TopicArticle/PartData?key=10663

Buckingham, D. (2003). *Media education: literacy, learning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 Polity.

Grizzle, A. & Calvo, M. C. T. (Eds.). (2013).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Policy and Strategy Guidelines*. UNESCO.

Huang, T. (2013).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of the ICT curriculum in Taiwan.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 *35*(4), 407-422.

Lin, T.-B. (2010). Conceptualising media literacy: discourses of media education. *Media Education Research Journal*, *1*(1), 29-42.

Lin, T.-B., Mokhtar, I., & Wang, L. (2015). The construct of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Singapore education system: global trends and local policies.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 *35*(4), 423-437.

Memon, A. S., Rigole, A., Nakashian, T. V., Taulo, W. G., Chávez, C., & Mizunoya, S. (2020). COVID-19: How prepared are global education systems for future crises? *Innocenti Research Briefs* (2020-21).

UNESCO (2022). *Global Monitoring of School Closures Caused by COVID-19*. https://en.unesco.org/covid19/educationresponse.